

开拓与探索的历程*

——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回顾和展望

刘铁梁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北师大民俗学学科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最著名的学术中心, 在改革开放后 20 几年中进入了发展的高峰。钟敬文率领学科点队伍实现了从民间文学向民俗学的拓展; 不断提出了创新的观点和学术主张; 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相促进的新局面; 建立了民俗学人才培养的模式。总结这段经历所得到的基本经验是, 学科的开拓与前进, 必然是顺应时代要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学术创新的过程。学科特色及优势的形成, 根源于不断开拓与探索的实践。学科今后必须坚持学术创新精神, 同时要适应全球背景下文化建设的新形势, 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 全面建起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 民俗学; 学科建设; 钟敬文;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2)05-0076-09

前言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 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包含民间文艺学)最著名的学术中心, 在全国高校文科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开创者之一的钟敬文教授长期领导了这一学科的建设, 直到 2002 年初他年届百岁而辞世。1949 年, 钟敬文教授在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的课程, 并开始培养担任这一课程的青年教师, 1953 年起招收了第一批本专业的研究生。这种情况, 特别是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 表明在新中国的高等学校里, 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已经正规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在长达 30 年里仅局限在民间文学的范围内, 未能形成完整的格局。在改革开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钟敬文教授率领学科点队伍锐意进取, 依托“民间文学”进行“民俗学”的学科整体建设, 经过几年的实践促使民俗学在高校中获得正式的建制, 进而又不断提升了民

* 收稿日期: 2002-06-20

作者简介: 刘铁梁(1946-), 男, 辽宁省绥中县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

北京大学在 1920 年成立歌谣研究会, 1922 年创办《歌谣》周刊; 中山大学 1927 年成立民俗学会, 是年创办《民间文艺》, 1928 年起改出《民俗周刊》。历史上的这些属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术活动, 虽然是依靠大学而开展, 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主要是学者们志同道合互相协作的行动, 还不能说那时已建立由专职人员组成的正式机构, 更难说已设置持久固定的人才培养机制。

俗学在高校文科中的地位。1988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学”被教育部认定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九五”期间成为国家“211”工程子项目建设的学科。1997年，“民俗学”被首次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将“民间文艺学”包含于其中。此后，以民俗学为名称的本学科点，又继续于2000年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于2002年再次通过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审查和批准，从而进入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规划。总的来说，最近20几年，北师大民俗学学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并且对全国民俗学的恢复与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带头和推动作用。这段经历是值得认真给予总结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民俗学史上的一个研究课题，但本文就此发表一些初步认识，是为了学科能够合理利用已有的经验，形成今后更加自觉的发展思路，向着更加远大的目标前进。

一、学科开拓建设的基本经验

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在近20几年的发展，主要说来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研究的领域从“民间文学”拓展到“民俗学”；二是先后提出了“民间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学术主张或理论方法体系；三是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创新性学术研究成果，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相促进的新局面；四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了层次和扩大了规模，向全国高校同行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教学改革经验。学科建设能够取得这些开拓性的进展，归功于钟敬文教授的有力领导、言传身教和率先实践，也离不开他的弟子张紫晨、许钰、陈子艾、潜明兹等几位教授和刘魁立兼职教授所发挥的学术带头作用。岗位上的中青年教师在教学改革和各个研究方向上的艰苦探索，使学科得到了不断发展的动力。来自各地兄弟院校的访学教师和历届研究生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也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难以忘怀。

从民间文学向民俗学的拓展，是本学科近20几年发展的基本经历。从1979年起，北师大受教育部委托组织全国高校力量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使得一些原来从事民间文学专业的人员被重新集结起来，标志着在“文革”后民间文学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得到恢复。当时，需要解决的主要学术思想问题是消除“文革”极左思潮以及教条主义遗留的影响，同时也需要重新建构民间文艺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概论的编写担负起突破思想障碍和打好学科建设基础的艰巨任务，这个任务用一年多时间完成，成果于1981年出版。与此同时，钟敬文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点在1982年开始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实际开始招进博士生。经过几年教学科研实践，本学科自1986年起，实际上已由单一的民间文学研究方向扩展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研究方向，尽管那时在国家的《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尚没有“民俗学”的名目。为将两个研究方向统一起来，并扩大与相邻学科的合作关系，钟敬文与张紫晨等从90年代初又酝酿成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这件事情的起因，也是受到当时整个学术环境的影响，与当时发生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热潮有一定关系，包含着倡导和加强民间文化研究的动机。张紫晨去世之后，1993年

张紫晨教授在1986年招收第一批民俗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7年又开始招收第一批民俗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而，在“中国民间文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目之下形成两个研究方向，即“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这样的包含关系虽然不够合理，但作为一种行动的策略，却为10年之后在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正式列入“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打造了实践的基础。

在钟敬文指导下，我们正式提出建立与教研室同体异称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获得了学校的批准。这一举动，反映出我们根据学科发展规律和适应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积极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的进取精神，因而受到了学界广泛的赞同。民俗学概论性著作在1985年就已问世，不过，北师大在本科生中开设这种课程稍晚于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从1989年起，许钰等先后在中文系主讲民俗学。与此同时，学科点1987年开始连续接收民俗学的高级访问学者，从1994年起开始招进博士后研究人员，至此，我国民俗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在北师大首先达到最高层次和形成最完整的机制。

学科总体上是适应社会和学术环境的变化，按照学科发展规律而积极进行建设的，回顾这一过程，可以总结出三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学科建设目标和任务的确定，需要顺应学术发展的时代潮流，力争占据全国同类学科建设的制高点。进入80年代前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与多种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民俗学研究已被呼吁恢复和大力开展，这种情势使本学科点的发展既获得了机遇也迎来了挑战。事实上，民俗学恢复伊始学科点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全国民俗学恢复建设的策源地。钟敬文在1979年与其他6位著名教授联合发出恢复民俗学的倡议，他又在1983年亲自主持中国民俗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并被选为学会的理事长。为使中国民俗学重新踏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钟敬文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俗学整体建设的论文和讲演，起到了他作为引领者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民俗学恢复、建设的一些具体工作任务历史地落在钟敬文所领导的北师大学科点。可以说，我们做到了“不辱使命”。例如在学术活动的组织方面，学科点作为中国民俗学会常设办公地点，支持召开了几次全国学术会议，还举办了多次研究班、讲习班和经常性的报告会等。更重要的任务是，我们开展了基础理论和学术史等多个重点研究项目，特别是扩大了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加强了教学改革和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正是这些任务的完成，才使得学科点真正成为全国民俗学发展的中心。

第二条基本经验是，学术的开拓和创新，必须尊重民俗学发展规律，特别是要突显对中国民俗学性质、特点等根本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在民俗学被恢复之初，教师们为了胜任工作，都自觉地重温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在继承我国民俗学传统的同时，也尽力吸收国外新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以能够进入学术主流和占领学术的某些前沿。我们认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其内容不仅极为丰富且有待发现，又有着与上层知识分子创作很不相同的特征，因而在资料的收集、理论的解释和方法的创新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有所突破，既不能完全照搬上层精英文化研究方式，也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研究经验，因此不断地向前开拓和勇敢探索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三条基本经验是，学科改革和创新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持和发扬了民俗学历史上形成的学术革新精神。中国现代的民俗学在“五四”时期诞生，它既受到西方先行的民俗学等现代科学的影响，又与时代的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潮流发生着密切联系，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显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了当时学术思想上的民主性倾向与革新精神。在以后的

此建议受到从海外归来的王铭铭博士的敦促和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教授的赞成及附议；杨国昌副校长直接指导了建所工作。

如1985年先后出版了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和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

发展过程中，民俗学关注民众的科学性格一再地显现出来而没有褪色，它对于学术界突破原有疆界和眼光局限，对于整体观地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对于认识现实的国情与民情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启发作用。因而，我们也切身体会到，民俗学在探索中尽管会遇到较多的困难和障碍，但只要坚持对民俗学的自信，坚持学术创新的精神，就必然会打开工作的新局面。总括上述三条经验就是：学科的开拓与前进，必然是顺应时代要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学术创新的过程。

二、学术创新的主要成果

最近 20 几年，钟敬文领导北师大民俗学加强了学科基础的建设，重点开展了基本理论和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创新的成果首先集中于这些著述之中。另一方面，学术整体的创新需要以大批专题和个案研究给予支撑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在各个分支方向上，我们也发表出版了具有较高水平、数量可观的论著和调查报告。在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探索过程中，学科进一步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逐渐显现出比较鲜明的特色。

在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学术史等研究方面，钟敬文陆续地发表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多篇重要论文，更主编了《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两部标准教材。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中国民俗学史》，许钰的《口承故事论》，刘魁立的《刘魁立民俗学论集》、潜明兹的《史诗探幽》、《神话学的历程》等专著，陈子艾的《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开端》等重要论文，都是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先后出版了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27—1937）》、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等，教师们也发表了一些在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多具有理论方法或分析批评上的创造性见解。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学科点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了比较大的力量，也取得了明显的收获。对于理论方法体系和学术传统的研究，不仅是民俗学恢复之初最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伴随民俗学整个发展过程需要不断深入开展的工作，因为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开展，理论方法和研究方向的问题会一再被提出。所以这类研究也经常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或问题意识，如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黄涛的《民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等，就是对民俗学整体或者局部理论问题的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再如朝戈金的《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式句法研究》及贾放新近完成的《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等在对域外民俗学理论的掌握或运用上也颇有深度。

例证的举出不可能详尽，但已经说明学科点在基本理论、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比较突出的。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研究对中国民俗学在新时期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加强基础和带动整体创新的重要作用。钟敬文的贡献最为显著，不仅主持了这方面的几个重点项目，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史”等，而且写下一系列重要论著。他提出的“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民俗文化学”和“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重要观点或学术主张，是近 20 几年来他在探索中取得成功的几个阶段性标志，体现了学术思想的一再发展与升华。钟敬文在 1981 年明确指出，由于民间文学与一般作家文学比较起来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研究它的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跟‘作家文艺学’有共同点也有差

异点的文艺学”。这一基本观点，与以前多次讨论过的“民间文学是特殊的文学”稍有不同，却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而慎重提出的。早在1935年，钟敬文就发表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的论文，算起来已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在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艺学由于深入反思和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可以说真正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例如对于民间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家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或有了新的突破。“民间文艺学是特殊的文艺学”这一基本观点，还支持了在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也就是说从生活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民间文学视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以统一起来给予研究。钟敬文于1980-1981年发表的《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和《刘三姐传说试论》，就是在当时进行这种研究的成功范例。1991年，在民俗学恢复10年以后，钟敬文提出了“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的观点和建立“民俗文化学”的主张，这方面的论述都被收入稍后出版的《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书中。钟敬文在关于民俗学总体结构思考的基础上，阐明了民俗学在中国文化整体研究当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在民俗学方法论的探讨上发表了深刻意见。此外，由于论述当中已包含着对中国民俗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研究特点等进一步的考察，因而就为几年后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主张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1998年底，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发表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演讲，2000年出版了同名专著，引起了民俗学界广泛的反响。笔者认为，这一学术主张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用中国学者的科学理性及人文眼光来研究中国民俗的实际，由此而建立在世界民俗学之林中的中国民俗学派。这是钟敬文晚年留给下一代民俗学人思考的中心题目，事关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许需要深入的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深明其意义。

在另一方面，学科点在民俗专题或个案的实证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快的进展，承担了一些重要项目和取得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既是对基础理论建设的检验与充实，也是对民俗学各个研究方向的开拓与掘进，都值得充分给予肯定。钟敬文在这方面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神话、传说、故事及学术史个案问题等研究领域都发表了出色的论文。如获得首届国家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对于中外学界关于这一神话所讨论的若干重要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判断。再如《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以及上文提过的论著等，都产生很大的学术影响。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已准备多年的几项研究课题只得指

《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代卷头语》，钟敬文主编《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参见拙文《钟敬文“民俗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及方法论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钟敬文的认识大体是：从先秦到现代，中国人对民俗的理性认识有“观风知政”或知识分子依恋民俗而想象理想社会模式等特点，但这种“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因而是值得珍视的遗产；“五四”以来诞生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尽管是借鉴了外国的理论，但始终还是有中国的特点；今天，面对中外现代文化科学的交流、碰撞、融会和矛盾，“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说我们的民俗学就是中国学派？”这是民俗学该如何发展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11-2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导研究生来完成，但成果中也包含了他的心血。当然，他悉心指导的很多博士、硕士论文也大多属于这种性质的研究，并取得了成功。张紫晨关于民间戏曲、宗教信仰，许钰关于故事、传说，潜明兹关于史诗、神话，陈子艾关于歌谣、少数民族风俗等等各有重点的研究，也共同构成了本学科在实证研究方面的领域。

近 10 多年，以中青年为主，承担了“中国农村变革中的民俗文化与民间文艺”、“转型期的民俗文化研究”、“近世中原民俗志与下层文化建设”、“华北庙会文化研究”、“当代民间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异”、“明清北京城市空间研究”等部级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村落民俗志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还有两岸合作的关于中国“底边社会”民俗的调研项目。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有的也强调对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都要求在深入调查、体验民众生活和详细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的深刻分析与思考。钟敬文常说，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的“看家本领”。近 20 几年来，在他的倡导和张紫晨、陈子艾等率先实践的影响下，我们的调查工作，已经超越了 80 年代以前以搜集、记录口头文本为目的的“采风”形式，而真正成为“实地研究”意义上的科学手段。学科点的这一变化，使我们在研究上积累了更多的实际经验和增长了更多的理性认识，体现了当代民俗学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先后出版的一批反映这种研究风格的著作，如杨利慧的《女娲神话及其信仰》《女娲溯源》、董晓萍与美国学者合作的《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赵世瑜的《狂欢与庙会》等，不仅在对于民俗事象的描述上更为全面，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有新的建树，其中赵世瑜的研究具有将民俗学和历史学结合的特长。刘铁梁、董晓萍还写了比较多的民俗志文章，如《传统乡村社会中家庭的权益与地位》《华北说唱经卷研究》等，也结合实地调查研究的经验发表了《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民俗志式田野作业中的学者观念》等论文，分别提出了：作为民俗传承生活空间的村落研究的重要性、民俗志研究方式的逻辑和目标等观点或主张。

综合来看，学科点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以下四个学术特色：1. 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重，二者互相促进和协调发展。具体来说目前主要有三个大的研究方向，就是理论民俗学、历史民俗与民俗志学、民间文艺学，体现了我们对民俗学进行整体建设的意识。2. 坚持学术创新，注重对中国民俗文化及民众生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民俗学理论方法进行不懈的探索。从风气上可明显看出，一是强调自觉观察民众无比丰富的文化创造及其纷繁变化，大力开展田野作业，做到不断有所发现；二是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努力营造学术创新气氛和严肃治学的环境。3. 注重学科的交叉与合作。中国的民俗学，与本土历史上关注民族民间的学术传统保持着天然联系，也与多种现代社会科学有交叉合作的关系。我们在发挥民俗学自身长处的同时，注意运用历史学理论方法，也吸收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等相邻科学的理论方法，以期对民俗事象做出深入认识和描述。4. 关注现实，服务社会。这是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学科点长期积极参加“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最近正参与和配合“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我们也担负了北京和某些地方的民俗学应用研究项目；师生们写出的许多报告、论文和著作，由于包含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因而具有为社会

如程蔷的《中国识宝传说研究》、杨利慧的女娲神话研究、刘宗迪的《山海经》研究、赵宗福的西王母神话研究等。

服务的巨大潜力。

三、教学改革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九五”期间，教研室两次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教改项目“中国民俗学科的创建与实践”获得国家级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此外，钟敬文和杨利慧分别获国家级优秀教师奖。我们能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科教兴国”的大环境和北师大“百年老校，再铸辉煌”的小环境，但是一代宗师钟敬文的核心作用和榜样的力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在开拓学科研究领域的同时，把人才培养作为中心任务，坚持以教学改革推动学科的全面建设，因而才达到教学和科研双丰收的目的。在此一过程中，我们加强了本科的民俗学教学。现在，“民间文学概论”是中文系必修课程，“民俗学”和“神话学”分别是必选课和选修课，“民俗学”还在全校和跨学校开设选修课。这就为学生认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学习研究这种文化的科学知识提供了比较优良的条件。我们更进一步加强了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经过数年的奋斗初步建立起民俗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在全国高校率先成为具有完整教学科研体制的民俗学人才培养单位。

“八五”期间的教学改革完成了由民间文学向民俗学拓展的课程设置任务，“九五”期间继续加大教改力度，目的是在加强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基础上，使博士、硕士培养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明显提高。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1. 包括民俗学自身和相关学科在内的研究生课程得到设置，以拓宽教学的知识结构；2. 田野作业、读书讨论等科研能力的训练得以强化；3. 特别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田野作业与掌握文献、基础与创新等三组关系。首先，我们着眼于知识结构的完善，设置了各种层次的课程，主要有以下数种。硕士学位基础课：“中国社会——文化史导论”、“文化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导论”、“民俗学导论”等；硕士学位专业课：“中国民俗学史”、“民间社会制度研究”、“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论”、“民间叙事文学”、“民间韵文学”、“当代文化人类学专题”、“宗教民俗学”、“民间物质文化研究”等；博士学位专业选修课：“民俗学研究”、“中国民俗学史”、“外国民俗学史”、“民俗志学”等。其次，田野作业和读书汇报，现在已作为训练基础研究能力的基本手段，也是理论教学中不可缺少的方法。学科点经常举行田野作业和读书的汇报会，促进学生走向田野和广泛阅读参考文献，并在讨论中增长学识。有些课程如“田野作业方法论”、“民俗志学”、“宗教民俗学”等，在讲课的中间就尽量安排实地调查研究活动。再次，上述“三组关系”的强调，是为了对学生在学习中可能发生的偏颇及时加以纠正，使学生真正养成良好的学风，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具备较高的研究能力。总之，教学改革是从实际出发，突出解决一些主要问题，以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目的。同时，也是贯彻了教书先育人的精神，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能够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在实践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近20几年来，从学科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总数71人，博士研究生总数31人。研究生培养数量在“九五”之初进入高峰，其中博士生数量增长较快，毕业人数是“八五”期间的2倍，少数民族比例增长3倍，答辩评定的优秀率在80%以上。他们已在各高校、科研机构很快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以往的还是新近被批准的民俗学硕士点上，有很多学术带头人都是北师大的研究生、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其中不乏在学术上已有较高成就的年轻人。目前在读博士生保持在20人以上，硕士生保持在近30人左右。这些都说明，学科点在人才培养方面对

全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这些成绩和前述学术特色的背后，还可以看出本学科点所具有的优势，主要是在三个方面：1. 民俗学是比较新兴的学科，而在北师大却有相对长久的历史，拥有很多经验和宝贵的传统。2. 梯队力量正发展壮大，年轻学术带头人已占多数，起了顶梁柱作用，整体力量在国内同行中属于雄厚。3. 在国家、学校的长期支持下，在资料、实物和设备等条件方面已具有良好基础，现有藏书 25 000 册的专业资料室，有用于田野作业的大型现代化设备，建有一个以民间工艺美术品为主的民间文化陈列馆等。这些都是有利于高效优质地培养人才的条件。但是，也必须看到，已有的成绩和优势，并不能说明今后。在钟敬文教授离开我们之后的今天，如何将学科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四、关于学科今后发展的认识

顺应时代要求、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学术创新的精神，这不仅是学科以往能够取得较大成绩的基本经验，而且是今后能够继续前进的根本保证。学科必须要适应国家建设和科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将整体地提高民俗学研究水平和加快培养高质量民俗学专业人才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以此带动各项具体工作的展开。由于继续被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成事先承诺的任务。学科点在“十五”期间的建设目标是：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学术活动、硬件建设和为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全面建起学科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成为国内高等学校中最重要和在国际上知名的中国民俗学科。

为实现建设的目标，首先，要体察时代发展的脉搏，做出可能更加有利于学科发展的部署和安排。今天，民俗学已经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支生力军，但它的发展还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走上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文化建设上的任务显得更加突出和艰巨，一方面是中外文化的互相交流与抵制、渗透与冲击都明显加快，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性格和发扬民族精神，成为人们更加普遍关切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面临着和自然生态的保护同等重要的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因此，像在改革开放之初一样，民俗学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更加紧急。民俗学者在加快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加紧对现时民间传承文化的抢救性调查；还要积极履行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要在加强研究民俗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为普及科学文化和提高国民素质，补上民俗学面向社会进行教育的一课。总之，学科需要主动适应形势的变化，以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其次，要在加强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结合的传统，加快学术整体创新的步伐。民俗学研究将可能在民间文化保护、抢救工程中作出特别重要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应用性研究将高于一切，学科的基础性建设工作也许将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因为在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取学术研究的更多资料 and 更多切身的感受，还有作为学术理论源泉的民众智慧。实践证明，民俗学的学术创新与发展，特别依赖于与生活密切联系的研究实践。例如，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将可能提出如下的理论问题：民俗生活的整体性、特定时空中民俗现象之间相互解释的可能性、民俗文化特质和实际存在形态的矛盾等。所以学科点有必要利用当前有利的条件，进一步加强田野作业，既

建立起更为坚实的研究基础，又增长理论方法创新的活力。

再次，要深化教学改革，把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到新的水平。民俗学研究面临着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加强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各种学术之间并非存在深沟高垒的界限，在人才的培养上也是如此，只有不墨守成规，才能取长补短而发展壮大。因此，本学科点应当继续以既独立又开放的态度，着眼于知识结构的完备和研究能力的提高，对培养方案及时加以检讨和弥补不足，以利于不断提高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用人单位对我们输送的毕业生也会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学科点不能满足于现有的培养模式，要根据社会需求，适时地充实和修订教学内容、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特别是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调查研究能力的训练，以使学生在日后工作中能够适应岗位任务的要求，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北师大民俗学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虽然可能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认准合乎社会进步潮流的前进方向，发扬老一辈民俗学家的学术创新精神，继续进行顽强的探索，就一定会拥有更加光辉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钟敬文 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 [C]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2] 钟敬文 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3] 钟敬文 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 [C]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 [4] 许钰 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昨天与今天 [A] 钟敬文 民间文艺学文丛 [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 [5] 王文宝. 中国民俗学史 [M] . 成都: 巴蜀书社, 1995.

(责任编辑 林邦钧 责任校对 薛振恺 潘国琪)

Review and Preview of the Discipline of Folklore at BNU

LU Tie-liang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of folklore at BNU is the center of the studies of folklore and folk literature and arts in China. It reached the higher peak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eriod since 1978.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of. Zhong Jing-wen, the discipline transformed from the folk literature to folklore. The staff of the group provide with many contributions of new views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s,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through the mutual improvement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studies, and establishing a model of training of folklore researchers. The basic experience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respecting the laws of the discipline, and persisting the academic innovation. The featur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discipline root in the practice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Key words: folklor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exploitation; innov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chances; challenges